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
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
陽西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
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者
卷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
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
是雖然雖越人亦不敢
錫爭高下是洛陽者
也洛陽亦有黃芍藥
李紅鬱寧之類皆不
陽人不甚借謂之
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
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
丹而可知也此發重之知

“国色天香”

见证历史兴亡

——唐宋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

路成文◎著

 河海大学出版社
HOHAI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咏物文学研究》(08CZW012)系列成果

本书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7WKZDJC019)资助

“国色天香” 见证历史兴亡

——唐宋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

路成文◎著



河海大学出版社
HOHAI UNIVERSITY PRESS

内容简介

唐宋时期是中国牡丹文化的形成期和成熟期。牡丹诗词作为牡丹文化的主要载体,体现了士大夫文人对于牡丹及相关风俗、文化的关注、表现、反思。由于牡丹玩赏风习之演进与唐宋宫廷、政治、重要人物以及都城长安、洛阳、开封、中原等国家中枢地域密切关联,而尤与唐宋政治之盛衰、历史之兴亡相表里,因此,大多数以天下为己任的唐宋士大夫,在观照、题咏和表现牡丹之际,往往赋予其特别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蕴。透过唐宋牡丹诗词,我们清晰感受到,一方面,作为冷峻的史实,牡丹堪称历史兴亡与民族屈辱的见证;另一方面,作为痛切的回忆,牡丹被赋予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国家民族繁荣昌盛的象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色天香”见证历史兴亡:唐宋牡丹诗词的文化
观照 / 路成文著. --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630-5176-2

I. ①国… II. ①路… III. ①古典诗歌—诗词研究—
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9699 号

书 名/“国色天香”见证历史兴亡——唐宋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

书 号/ ISBN 978-7-5630-5176-2

责任编辑/ 张 媛 杨 曦

特约校对/ 史爱林

封面设计/ 黄 煜

出版发行/ 河海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西康路 1 号(邮编:210098)

网 址/ <http://www.hhup.com>

电 话/ (025)83737852(总编室) (025)83722833(营销部)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布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作者简介

路成文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200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晋升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7年晋升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在唐宋词及词学、中国古代咏物文学及建筑园林花卉文化、中国古代文体学等方面较有建树。已出版著作3部,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文献》等重要学术期刊);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2项;荣获广东省社科成果一等奖(2015)、湖北省社科成果二等奖(2011)、武汉市社科成果二等奖(2007)和夏承焘词学奖(2011);曾入选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工程”省级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2008);系中国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研究会理事。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初盛唐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	5
第一节 《宴赏双头牡丹》:武则天与宫廷牡丹玩赏之风的形成	5
第二节 李白醉赋《清平调》与盛唐宫廷牡丹文化的审美追求	10
第三节 牡丹审美活动的第一缕文人化气息——简论天宝名公及王维 牡丹诗	17
第二章 中晚唐牡丹诗的文化观照	21
第一节 中晚唐牡丹玩赏风习之转移	21
一、中晚唐宫廷牡丹玩赏风习之渐衰	21
二、宫廷以外牡丹玩赏风习之趋盛	23
第二节 充分体现士大夫文化精神的中晚唐牡丹诗	25
一、牡丹形质之美的进一步发现与表现	27
二、感物伤怀——感物传统下中晚唐牡丹诗情感内涵	29
三、刺俗嘲花——讽喻精神在中晚唐牡丹诗中的体现	37
四、人生世事之体悟——观物思想在中晚唐牡丹诗中的初显	43
五、感时伤乱——中晚唐牡丹诗对于时代巨大变迁的历史记忆	45

第三章 中国古代牡丹玩赏风习的极盛与洛阳牡丹“文化身份”的确立	47
第一节 政治中心的转移与洛阳牡丹风俗之极盛	48
第二节 欧阳修等士大夫文人的牡丹情结与洛阳牡丹“文化身份”的确立	50
第三节 洛阳牡丹及其辐射效应	55
第四节 牡丹与北宋政治(上):北宋贡花、万花会、赏花钓鱼宴及其兴废	61
一、贡花	61
二、万花会	64
三、赏花钓鱼宴	66
第五节 牡丹与北宋政治(下):仁宗天圣年间“二圣并立”与双头牡丹之瑞	71

第四章 颂圣文化与士大夫精神在北宋牡丹诗中的交织呈现——北宋

牡丹诗的文化观照	77
第一节 北宋时期基于颂圣心理而创作的牡丹诗	78
第二节 基于士大夫文人个性化精神、趣味或情感、经历而创作的牡丹诗	84
一、体现北宋士大夫文人博物之趣的牡丹诗	84
二、体现北宋士大夫文人闲逸情致的牡丹诗	85
三、借玩赏及题咏牡丹以观物明理	88
四、借题咏牡丹以咏史或批判风俗	92
五、借题咏牡丹以抒发北宋士大夫文人的感慨	97

第五章 偏安局面下南宋牡丹玩赏风习的发展

第一节 南宋宫廷牡丹玩赏活动的恢复	103
第二节 地方性、群众性的牡丹玩赏活动的延续	107

一、杭州	107
二、苏州	108
三、彭州	109
第三节 别具情衷的南宋士大夫文人的牡丹玩赏活动	111
 第六章 家国之恨与牡丹文化象征意义的确立——南宋牡丹诗的文化 观照	115
第一节 南宋前期牡丹诗:漂泊之感与流落之恨的集中抒发	116
第二节 南宋中后期牡丹诗:今昔之慨与家国之痛的频繁表达	123
第三节 南宋末迄宋元易代时期牡丹诗:黍离之悲与兴亡之叹的集 中迸发	132
 第七章 唐宋牡丹词的文化观照	138
第一节 北宋牡丹词:花王标格与牡丹崇拜	140
第二节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时光易逝的焦虑在宋代牡丹 词中的流露	142
第三节 “梦绕中原块土”——宋室南渡后牡丹词主题的升华	144
第四节 民族屈辱的见证,繁华盛世的象征——南宋牡丹词中深沉 痛楚的历史反思	149
 第八章 金元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	154
第一节 从金元牡丹诗词看金元牡丹栽培及游赏、题咏活动之一般 情形	155
一、金人或由金入元者,主要在金中都、洛阳或北方其他地区游赏 并题咏牡丹	155
二、由南宋入元者,或不仕元朝之逸民,主要在江南一带游赏并题 咏牡丹	157

三、仕于元朝的士大夫文人,在大都及仕宦之地游赏并题咏牡丹	158
第二节 金元牡丹诗词的主题取向	159
一、艳羨前朝风流:文化传承意识的些微流露	160
二、推重大都牡丹:“本朝亦盛”心态的一种表述	161
三、颇寓兴亡之感:异族统治下传统士人的幽怨情愫	162
第三节 金元时代题咏牡丹绘画的诗词浅论	165
结语 牡丹文化象征意义的遮蔽与还原	172
附录	175
“诗圣”或曾咏牡丹——兼谈杜甫两首诗的编年问题	175
《牡丹赋》与“甘露之变”——李德裕、舒元與《牡丹赋》新论	184
参考及征引文献目录	202
后记	206

绪论

在我国群芳竞艳的众多花卉中,牡丹是最负盛名的一种花卉。早在唐代,牡丹就获得了“国色天香”的美誉。北宋时期,牡丹的栽培与观赏更是趋于极盛,牡丹被赋予相当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被尊称为“花王”。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在称赞、欣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同时,称牡丹为“花之富贵者也”,因而牡丹又有“富贵花”之称。^①北宋时期,“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牡丹因而又被称为“洛阳花”或“洛花”。明清时期,民间和朝廷都有过将牡丹作为“国花”的共识,民国初年出版的《辞海》甚至直接称“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②。尽管1928—1929年之间,民国政府议定以梅花为“国花”^③,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带有法律意义的文件也就成为了历史。此后,虽然中央、地方或民间组织曾多次动议确定我国的国花,但因种种原因,该动议屡次搁浅,时至今日,我国政府仍然没有从法律意义上确定哪一种花卉为“国花”。^④不过,在文化界、学术界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牡丹依然享有相当于“国花”的崇高地位,是众多花卉中的“无冕之王”。

①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9册第279页。

② 如明中叶李梦阳(1473—1530)《牡丹盛开,群友来看》诗云“碧草春风筵席罢,何人道有国花存”;明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西郊极乐寺种植牡丹,称“国花堂”;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颐和园建“国华台”,主要种植牡丹。“国华”即“国花”之意,据史料记载,慈禧曾在此招待各国使节夫人游园赏花。以上参程杰《国花选择:历史选择与现实借鉴》,《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夏之卷。

③ 参程杰《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之史实考》,《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④ 参蓝保卿、李战军、张培生著,《中国选国花》,海潮出版社2001年版。

作为一种重要的观赏性花卉,牡丹在初盛唐之际以独特的方式——凭借宫廷和帝王后妃的特殊喜好,强势进入人们的审美观赏视野,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高频度地介入社会各阶层的日常文化娱乐生活,掀起了一股极为强劲的牡丹玩赏之风。中晚唐时期舒元興在他的《牡丹赋》序中称:“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预焉。……天后叹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寢盛。今则自禁闥泊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①此赋序中的“天后”即武则天,“上苑”即皇家园苑。对于牡丹审美观赏的风尚,即始于武则天的特别关注。

宫廷是牡丹审美玩赏风习的策源地,而广大士庶的热烈参与则是牡丹审美玩赏风习愈演愈炽的主要推动力。正因为此,牡丹便成为众多花卉中与政治之盛衰、天下之治乱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花卉。在朝政清明、天下太平的时代,牡丹审美玩赏的风习往往特别兴盛;但在天下板荡、家国衰亡的时代,牡丹玩赏之风习则往往趋于消歇。与此同时,牡丹栽培与玩赏的中心,似乎始终追随着国都或政治文化中心迁徙的线路,唐代盛于长安,北宋盛于洛阳,元朝则盛于大都(即今北京)。结合唐宋金元七百余年治乱兴衰史与牡丹玩赏风习演替史,我们可以清晰而深刻地观察体认到这些特点和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在几乎覆盖全社会各阶层的牡丹玩赏风习的参与者中,有一个重要的阶层——士大夫文人阶层,对于牡丹玩赏风习保持着有别于宫廷、市井、世俗社会的不同姿态。他们有时候是这种狂热风习的被动参与者,有时候又是这种审美玩赏风习的积极推动者;有时候是这种风习的热情讴歌者,有时候又是这种风习的严厉批评者。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既是牡丹玩赏风习的忠实记录者,更是牡丹玩赏风习的深刻反思者。归根结底,他们是我国古代丰富而深厚的牡丹文化的历史保存者、意义阐发者和文化赋值者。

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唐宋时代。

自初盛唐之际牡丹进入人们审美观赏的视野起,众多的士大夫文人便参与到牡丹审美玩赏的活动中来。以此为契机,他们纷纷创作诗词来题咏牡丹,记录或抒写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从而涌现出那个时代的许多经典的“牡丹之歌”。比如盛唐时期李白应制创作过三首著名的《清平调》词咏牡丹;中唐时期,李正封曾

^① 舒元興《牡丹赋》,参见《全唐文》卷727,清董诰等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85页。

写下广为传诵的歌咏牡丹的名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中唐时期，刘禹锡、白居易分别用“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牡丹芳》）来描述京城牡丹玩赏之盛；晚唐时期，李商隐创作的《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牡丹》等诗，以及温庭筠、薛能、罗隐等人所作的多首牡丹诗，大都各有所兴感，从而使牡丹玩赏活动从单纯的欣赏、赞美及热闹、从俗的休闲娱乐活动变成有相当文化品位的、能激发士大夫文人个性化情感的，乃至能够勾连起我国古代士大夫文人普遍具有的家国情怀的文化活动。

北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形成了持久而规模盛大的牡丹审美玩赏风习，与此相应地，以洛阳为中心的牡丹园艺产业也趋于极盛。牡丹种植规模以及新品种的发现与培育，引起了许多士大夫文人乃至朝野上下的特别关注。北宋自“澶渊之盟”以后，天下处于相对太平稳定的状态，社会经济保持较长时期的繁荣发展，这为牡丹审美玩赏这一带有精神享受性质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北宋士大夫文人以及普通民众对于牡丹审美玩赏的热情空前高涨，地方政府以及皇室宫廷甚至将牡丹玩赏活动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来施行。这种颇不同于唐代的牡丹玩赏活动风习和氛围，使得北宋牡丹诗词总体上与唐人牡丹诗词大异其趣。其中，与政治文化紧密关联的借题咏牡丹以呈瑞颂圣的主题，在北宋牡丹诗词中显得十分突出。与此同时，北宋士大夫文人在日常生活和学术活动中，对于牡丹也抱以特别的热情，或以学术性的眼光来对丰富而引人注目的洛阳牡丹及相应的风俗演进加以特别的关注，写出《洛阳牡丹记》之类的文章或著作，以记录北宋牡丹之盛；或以理学家的眼光在日常生活中将牡丹作为观照的对象，借观物及咏物以阐理明道。这使得北宋牡丹审美玩赏活动带上了比较鲜明的学术化色彩。

公元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使京洛蒙尘，二帝北掳，中原沦陷，北宋灭亡，宋室南渡。这是两宋历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唐宋牡丹审美玩赏风习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南宋最初的几十年，因特殊时势，牡丹审美玩赏活动近乎消歇；南宋高宗末及孝宗时期，牡丹审美玩赏风习稍稍恢复，但南宋的牡丹园艺远逊于唐朝和北宋。随着宋金对峙格局的形成，赵宋王朝收复中原、恢复两京（开封和洛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一政治情势对于南宋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心理造成极大影响。影响所及，南宋士大夫文人的牡丹审美玩赏活动也发生了质变，由唐

五代、北宋时期的热衷于玩赏牡丹本身,转变为一种心理上的沉痛感,即由牡丹所激发出来的主要不是对于花的赏爱,而是对于牡丹所维系的洛阳(中原、北宋、中州盛日)的追忆或联想,从而形成“牡丹—洛阳(或中原、中州盛日)”思维定式。南宋士大夫文人接触和欣赏牡丹的机会虽然远比唐朝和北宋人少,但他们却依然保持着题咏牡丹的热情,一有机会,就会将牡丹形诸诗词。在“牡丹—洛阳(或中原、中州盛日)”思维模式下,南宋牡丹诗词以充溢其中的家国情怀和历史反思意识,呈现出不同于唐五代、北宋牡丹诗词的特点,具有极强的时代性。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是颇引人深思的。而正是在这个不断题咏的过程中,牡丹被赋予了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牡丹也因此由一种供人欣赏的花卉,升华为一种附载特定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形态。牡丹文化经由此一情感、主题、精神的凝定过程而得到丰富并走向成熟。

基于笔者对牡丹文化及相关资料的掌握情况,本书拟重点结合唐宋牡丹审美活动的变迁以及唐宋牡丹诗词创作情况,重点揭示包括唐宋牡丹诗词在内的文学活动对于牡丹审美文化之丰富与升华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具体诠释唐宋牡丹诗词所附载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金元紧随两宋之后,士大夫文人因身份、地域、文化心理等差异,对牡丹这种曾经象征中州之盛、京洛风流的花卉,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心态。他们的牡丹诗词从文化内涵来看,总体并未越出唐宋范围,但部分作者通过题咏牡丹以表达“本朝亦盛”的文化心态值得关注。本书亦列专章加以阐述。

第一章

初盛唐牡丹诗词的文化观照

牡丹在唐代大规模进入人们的审美玩赏视野,无疑是一件富有传奇色彩的宫廷文化事件。武则天的特殊经历及审美好尚为宫廷种植、宴赏牡丹提供了最重要的契机,唐玄宗、杨贵妃对于牡丹花的由衷赏爱,以及李白在沉香亭奉命应制创作三首《清平调》牡丹词,对于宫廷乃至大众玩赏牡丹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初盛唐时期为数不多的牡丹诗词,因审美观赏和具体创作情境的不同以及作者个体情怀的差异,已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向。

5

第一节

《宴赏双头牡丹》:武则天与宫廷牡丹玩赏之风的形成

我国古代有着悠久的花卉审美文化,早在《诗经》的时代,诗人们已经在诗歌中歌咏桃花、李花、梨花、莲花(或荷花)、芍药、梅等,屈原的《离骚》除进一步强化了荷花意象外,又咏及菊、桂、兰、蕙等多种香花香草。这些早期的题咏,赋予了所咏花卉以最初的象征意蕴和文化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菊花、荷花、兰花、桂花、梅花等被诗人们以较高频率题咏,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内涵,使相应的花卉审美文化初步确立或走向成熟。与上述花卉不同,在魏晋南北朝及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除了在一些本草类著作中有记载牡丹根、皮作为药物的实用价值外,极少有欣赏或题咏、赞美牡丹花叶之美艳者。甚至在初盛唐之际,牡丹还没有自己的专名,仅仅因它与芍药是近属,形貌、花期比较接近而托名于芍药,被称

为“木芍药”。^①

初唐宫廷园囿一如前代，多植花草树木以供暇时游赏，故唐太宗《首春》诗云“寒随穷律变，春逐鸟声开。初风飘带柳，晚雪间花梅。碧林青旧竹，绿沼翠新苔。芝田初雁去，绮树巧莺来”，《仪鸾殿早秋》诗云“寒惊蓊门叶，秋发小山枝。松阴背日转，竹影避风移。提壶菊花岸，高兴芙蓉池。欲知凉气早，巢空燕不窥”^②。一春一秋，游赏于后苑或宫殿，其中梅、柳、松、竹、桂、菊、芙蓉等诸般花草树木，颇堪流连。唐太宗又有《采芙蓉》《赋得樱桃》《赋得李》《赋得花庭雾》《春池柳》《芳兰》《咏桃》《赋得残菊》《赋得临池柳》《赋得临池竹》《赋得弱柳鸣秋蝉》《探得李》等诸多咏花草树木的篇什，也当是政事之暇，游赏园池，即兴题咏或与群臣分题吟咏。从唐太宗的上列诗篇，我们不难看出，初唐诸宫殿园囿所植诸花草树木，已堪称琳琅满目。不过，检初唐宫廷文人诗集，尚未见有题咏牡丹（或木芍药）者。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初唐宫廷园囿之中，牡丹之游赏尚邈焉无闻。

从现存史料笔记及诗词作品来看，唐代宫中最早宴赏及题咏牡丹的活动发生在唐高宗后期。《龙城录》“高皇帝宴赏牡丹”条云：

高皇帝御群臣，赋《宴赏双头牡丹》诗，惟上官昭容一联为绝丽，所谓“势如联璧友，心若臭兰人”者。^③

这是一次因观赏后宫“双头牡丹”而举行的宫廷宴会，参加宴会的有高宗皇

① 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云：“牡丹亦有木芍药之名，其花可爱如芍药，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药之名。芍药著于三代之际，《风》《雅》之所流咏也。牡丹初无名，故依芍药以为名。”参（宋）郑樵《通志》卷七五，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68页。又，（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惟《谢康乐集》中言‘（永嘉，即温州）竹间水际多牡丹’。”（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世谓牡丹近有，盖以前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公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久矣。”参《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01、800页。这两则材料所记载的事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从审美角度观照牡丹的例子。但这两则都是中晚唐时期文人的追记，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和杨子华诚然已使用“牡丹”这一称谓，初盛唐时期比较通行的名称是“木芍药”，尚未普遍使用“牡丹”作为这种花卉的专名。如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沉香亭赏牡丹，便称所赏牡丹为“木芍药”。参（唐）李潜《松窗杂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

② （清）彭定求等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9页。

③ （唐）柳宗元《龙城录》，参《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帝、群臣以及上官昭容。上官昭容即上官婉儿，是初唐著名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晚年因事替高宗皇帝起草废后诏书，得罪武则天，被诬谋反，下狱处死。上官婉儿受其祖父牵连而配入掖廷为婢。后来因知书达礼、识文能断而被武则天所赏识，掌管宫中制诰，权重当时。结合高宗朝后期宫廷政治形势，不难推测这次宴赏活动的真正主角，乃是贵为皇后的武则天；皇帝及群臣赋诗以咏牡丹，包括参与应制作诗的上官婉儿，大多都有迎合武则天的意味。

《宴赏双头牡丹》虽然仅存一联，但仍可从中了解到一些基本事实。第一，宫廷园囿已开始栽植牡丹花，并且已培植出花形比较特异的品种——双头牡丹。为了观赏这棵双头牡丹，宫中举行了专门的宴会，群臣参与并赋诗，规模非同一般。宴赏活动的举行，显然是基于皇帝、皇后（即高宗、武后）的“圣”意。上官婉儿的诗，“势如联璧友，心若臭兰人”，显然也是语带双关，“联璧友”意指高宗、武后，“臭兰人”自然意在恭维武则天。

何以太宗朝宫中从来没有过牡丹之游赏与宴饮活动，到高宗后期却出现相当规模的牡丹宴赏活动？唐宋时期诸多文学作品或史料笔记对此做出了解答。唐舒元舆《牡丹赋序》云：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预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者所知。花则何预焉？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寢盛。^①

舒元舆是中唐著名政治人物，唐文宗时期曾担任宰相，文宗大和九年暮春，舒元舆得入后苑观赏牡丹园，写了这篇最早的《牡丹赋》。当年底，因李训、郑注等联合文宗诛杀宦官的密谋败露，宦官仇士良等利用文宗召诸人人内观赏甘露之机，反过来大肆诛杀在朝官吏百余名，制造了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时任宰相舒元舆同时罹祸。^②

从这则赋序来看，至少到中晚唐时期，士大夫文人对于牡丹何时及由谁移植到宫廷园囿，是有共识的，即牡丹是由武则天移植入后宫上苑的。欧阳修《洛阳

① （唐）舒元舆《牡丹赋》，参《全唐文》卷727，清董诰等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85页。

② 参拙文《〈牡丹赋〉与“甘露之变”——李德裕、舒元舆〈牡丹赋〉新论》，《江海学刊》，2017年第6期。

牡丹记》有相近的记载：

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己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洛阳牡丹记·花释名第二》）^①

欧阳修（1007—1072）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思想家。青年时代，他曾任洛阳留守推官，见钱惟演在屏风上详书牡丹名品 90 余种，^②又亲睹洛阳牡丹之盛，对洛阳牡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洛阳牡丹在北宋政治、经济乃至日常生活中均已扮演特殊的角色，因而后来特别撰写了这篇《洛阳牡丹记》，以记录北宋洛阳牡丹之盛。这则材料谈的是洛阳牡丹种植及玩赏风俗兴起的缘由。结合《洛阳牡丹记》全文内容，以及他在诗歌中持续言及洛阳牡丹的情况，我们认为，他在详细调查、了解洛阳牡丹风俗的基础上，将洛阳牡丹之盛归因于武则天的赏爱，这与舒元舆的记载基本一致。

武则天早侍太宗，再事高宗，进而以周代唐，成为千古唯一女皇帝。她之所以会与草木之微的牡丹发生如此密切的关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她的家乡有花形“特异”的牡丹花，而宫廷园囿中居然没有。

武则天，并州文水人。文水在武德中尝属汾州，汾州又称西河郡^③，其地盛产牡丹。武则天少时或许对家乡牡丹留有深刻印象，因而在她入宫之后，在游赏诸皇家园囿时，发现这里尽管众芳争艳，唯独没有牡丹花，因而“叹上苑之有缺”，命人将牡丹引种至宫中。《龙城录》所记“高宗宴赏牡丹”，显然是武则天将牡丹移植后宫园囿之后的事情。此次在宫廷中专门举行宴会观赏牡丹并命群臣赋诗咏牡丹的活动，意义和影响甚大。首先，它标志着持续千年，几经兴废，并且最终

① 参（宋）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98 页。

② （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余居府（西京留守钱惟演府第）中时，尝谒钱思公（钱惟演）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座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这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参《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 1892 页。

③ 文水县，“武德三年改属汾州，六年还属并州，明年又属汾州，上观初复故”。“汾州府……，天宝初曰西河郡，乾元初复曰汾州。”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卷四十一，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826、1939 页。

被赋予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中国古代牡丹审美玩赏风习正式拉开序幕。其次，这种宫廷宴赏牡丹的审美玩赏形式也相沿成习，到北宋前期，演变为几乎年年举办的大规模的专门宴飨活动和礼仪制度——“赏花钓鱼宴”。

《全唐诗》另收有一首署名武则天的诗《腊日宣诏幸上苑》，与牡丹略有关系。诗云：

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全唐诗》第58页）^①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载有此诗本事：

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曰（诗略）。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大凡后之诗文，皆元万顷、崔融辈为之。^②

按照计有功的说法，这首诗未必是武则天所作，此事也未必实际发生过。不过，后人仍然据此演绎出武则天怒贬牡丹至洛阳的故事，如清代李汝珍《镜花缘》第四回“吟雪诗暖阁赌酒，挥醉笔上苑催花”、第五回“俏宫娥戏夸金盏草，武太后怒贬牡丹花”，^③便是由这首署名武则天的诗演绎出来的。这些故事或记载虽不可信，但却表明在后人心目中，武则天在牡丹审美玩赏风习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武则天的特别关注，使牡丹这种原本在北方山西、陕西、甘肃、河南一带比较普通常见的，并不太受到人们关注的花卉，从凡花丛卉中脱颖而出，成为“花中新贵”“一代名花”和唐人的最爱！

① 除特别说明外，本书所引唐人牡丹诗均据《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以下只随文标注作品所在页码，不再一一出注。

②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③ （清）李汝珍《镜花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